

#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对科举制的冲击

○刘希伟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摘要:** 近代留学教育从其发轫至 1905 年, 由初期的留美、留欧, 经由中日甲午战争而转向留学日本。从教育制度上看, 由时势促成的近代留学教育本身, 即是冲击古老封建科举教育的一股新生力量。清政府对待留学教育的态度, 由最初有志之士的极力倡导和顽固派的极端性抵制, 逐渐演变为科举废止前的极致性认可, 留学章程中出现了“授予优秀留学毕业生以科名奖励乃至相应官职”的规定, 由政策法规上的保证使得留学教育对科举制的冲击进一步加深。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近现代教育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了科举制的解体。

**关键词:** 留学教育; 科举制

**中图分类号:** G 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916(2006)11-0088-04

曾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 终因清政府的遽然废止而于 1905 年走完了长达 1300 年之久的历程, 永远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的最直接动因是为了发展学堂, 但科举制的解体却不仅仅由学堂造成。作为近现代教育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学教育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对科举制形成了相对隐性与间接的冲击。随着留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清政府对其也越来越重视, 以至于出现了“授予优秀留学毕业生以科名奖励乃至相应官职”的官文规定, 由此对科举制形成的冲击也显得更为直接与激烈。笔者从隐性与显性两个相对角度来探讨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对科举制造成的冲击。

## 一、科举制废止前留学教育的发展概况

1847 年, 容闳与黄宽、黄胜在教会的资助下, 随马礼逊纪念学校校长布朗赴美留学, 这一历史性的出洋受教可视为近代留学教育的滥觞。容闳曾先后就读于麻省孟松中学和耶鲁大学, 并于 1854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 成为近代史上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受美国资产阶级教育熏陶长达 7 年之久的容闳认为, 应当使其他人亦能享受此种文明教育, 依此达到“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因此, 归国后的容闳十分注意教育改革, 极力倡导留学教育, 对近代留学教育的开展功不可没。

近代学人舒新城曾言, “无容闳, 虽不能说中国无留学生, 既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而且派遣的方式可能是另一个样子”<sup>[1]</sup>。容闳于 1868 年向热心洋务事业的江苏巡抚丁日昌

提出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 因种种原因未果。1870 年, 容闳再次力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 后由曾国藩、李鸿章专案会奏, 至 1871 年获得清廷批准, 近代留美幼童的派遣也在其后的 1872 年正式开始。自 1872 年至 1875 年, 共有 120 名幼童先后分 4 批抵美留学。由于 1875 年后任留美学生监督的吴子登极力诋毁容闳纵容留美学生, 并与驻美公使陈兰彬等破坏留学政策, 奏请撤回留美学生, 这些留美幼童遂于 1881 年被撤回中国。

几乎就在幼童们被陆续派赴美国留学的同时, 福建船政局也开始考虑派遣毕业生赴欧留学的事宜了。福建船政局的初期建设于 1873 年基本完成, 根据当时合同的规定, 聘请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船政学堂教习不久即将遣散, 因此提高毕业生的培养质量, 使之能够代替外国技术人员便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着眼于船政学堂学员培养质量的提高, 船政大臣沈葆楨在 1873 年 12 月上奏清廷的《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提出了派遣学生赴欧留学的建议。清廷旋即派沈葆楨的奏折批转总理衙门“速议具奏”, 得到了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热切支持。“闽厂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 洵属探本之论”<sup>[2]53</sup>。

1877 年初, 由李鸿章领衔, 沈葆楨及丁日昌等反复讨论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 很快获准。派遣船政学生留欧的目标主要在于: 赴法国学习制造者“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 方为成效”。赴英学习驾驶者“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 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 方为成效”<sup>[2]57</sup>。同年 3 月, 在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

收稿日期: 2006-09-10

作者简介: 刘希伟(1981-)男,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史。

以及随员马建忠等人的带领下,首届留欧学生从福州出发,经由香港抵欧留学。这批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年至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福建船政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受到了首届留欧显著成效的鼓舞,后来福建船政局又陆续派遣了四批毕业生赴欧留学。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中国的惨败彻底惊醒了“老大中国四千年的迷梦”,深重的民族灾难掀开了留学教育的新篇章。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由一个“蕞尔小国”一跃跻身世界列强的事实,日本政府欲图笼络中国高层知识分子而制定的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族危亡感的强烈震荡以及中日两国在文化地理上的接近性,这些因素共同所促成了清政府以敌为师的改良措施,留日热潮由此开始出现。1896年清政府出使日本公使裕庚带领唐宝锷等13人赴日留学,是为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的开始。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这一年留日学生达到269人。随后留日学生迅速增加,1902年的留日总学生数为727人,1903年达到了1242人,至1904年已经超过2500多人,1905年则达历史最高记录为8000余人<sup>[3]</sup>。总体上看,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不久,1905年科举制废止以前,留日热潮即已出现并且发展非常迅速。

## 二、留学教育对科举制的隐性冲击:从教育与文化的角度

从教育制度上看,留学教育的兴起本身即是近现代教育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各国之间相互了解的窗口与纽带,对于文化的交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教育上的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教育近代化来说,他们在文化交流、教育转型上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日本、美国在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都曾大量的派遣留学生出国求学。日本在近现代教育制度建构中十分注重留学教育的开展,自1866年幕府颁令允许自由去海外贸易和求学后,许多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五条誓文》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列为基本国策之一,随后大批的学生开始被派往海外留学。从1868年至1874年就有五百五十多名学生外出留学<sup>[4]</sup>。美国亦是如此,在近代教育的转型时曾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去欧洲各国学习先进文明。

近代留学教育作为教育发展中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冲击封建科举教育的过程。“正如曾国藩、李鸿章所曾经指出的,‘远适肄业’一留学生派遣,与‘开馆教习’一创办新式学堂,始终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驱动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sup>[5]</sup>。从教育的角度看,当科举制失去了往昔的生机与活力而呈现奄奄一息之势时,留学教育和新式学堂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两支重要力量在与科举教育博弈的过程中,焕发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留学教育在物质、制度、精神的不同层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引进,对相互支撑的儒家文化和科举制造成了全面的冲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在清末所受的强烈抨击以及进行改革的种种尝试亦与留学生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与传

播是分不开的。与洋务运动接受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物质文化相对应,早期留美与留欧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与引进也主要是在器物的层面上展开。在洋务派“寓强于富”、“先富后强”思想的影响下,光绪初年兴起了重商富农的思潮,这种转变反映在早期留学教育上则是在注重军事教育的同时迅速转向实业教育。对实业教育的关注与转向尽管尚属初始阶段,不免显得有些稚嫩,但却为接受近代西方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时期的留学生已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逻辑等思想学说引介到了中国,这意味着留欧教育已经对西方的制度乃至精神文化有所触及,严复的《天演论》即是这样的一本译著。

甲午之役后,在朝野共同一致的推动下,留学教育迅速转向日本,出现了留日学习西政的高潮。留日教育以学习政法、师范、军政为主要内容,人数众多且多为速成生,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教育制度影响甚大。随着留学生将近代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引进与中西文明冲突的加剧,科举制中的儒家经典的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所受的否定性批判亦不断升级,抨击科举制的呼声也一浪高于一浪。“儒学的衰败虽然不完全是由于留学教育的冲击,但是它的衰败却使得科举制度的思想统治机能失去了效力,并进而动摇了其作为思想支柱的地位。这样科举制度的解体就为时不晚了”<sup>[6]</sup>。

留学教育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引进为清末有志之士认清科举制与时代的脱节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参考系。当西方开始进入近代社会后,古老的科举制作为一种教育考试制度与时代的脱节就已经静悄悄地开始了,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使得这种脱节更加突显,而留学生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引进则使得科举制所受的抨击从教育的角度激烈地展开。作为封建社会考选制度的科举制发展至清代时,其考试内容与元明两代相似,几乎完全限定在了作为其正统科目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内,而缺乏近代新学的内容。文体上所承袭的明代八股文在其考试形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考试文体滋生的弊端日益加重。

国势衰败在于人才匮乏,人才匮乏在于教育不振,这种逻辑推理几乎成了近代以来一切进步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思维定势,因此晚清人士主要是将科举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来加以抨击、变革乃至最终的废除。从礼部奏请考试算学到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从严复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到康有为、梁启超有关变革科举的奏请,这些欲将近代新学整合至科举中的种种尝试终因科举制的巨大历史惯性而难以奏效。

晚清科举因考试内容空疏褊狭、士习颓废及科场黑暗等原因使得所选人才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其所面临的危机亦属空前。当帝国主义从中国人身上割肉舐血与敲骨吸髓的侵略愈演愈烈,“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三十多年的风雨飘摇过后无可挽回地恶变为残局,在非过正就无法矫枉、虽不能变则必废的思维模式下,科举的命数最终走到了尽头。科举废止的最直接动因是为了兴办学堂,而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则潜在地从物质、制度、精神不同的层面冲击着科举制,加快了科举制的解体。

### 三、留学教育对科举制的显性冲击：“科名奖励”和“由留学入仕”在留学章程中出现

总的看来,清政府对待留学教育的态度由最初有志之士的极力倡导和顽固派的极端性抵制逐渐演变为科举废止前的极致性认可。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生与有志之士极力倡导是分不开的,除前文提到的容闳、沈葆楨、丁日昌等为留学教育的开展尽心竭力以外,李鸿章、张之洞、薛福成等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鸿章在办理上海制炮局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培养本国人才的重要性。“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sup>[7]</sup>。在曾国藩采纳容闳有关派遣留美幼童的初期,李鸿章就积极支持和参与,并与曾国藩共同上奏清政府“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后来李鸿章又和沈葆楨一同向清政府上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薛福成曾上书曾国藩,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

此外,张之洞对开展留学教育则更为热心与支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顽固派的极端抵制。清末顽固派担心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会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从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社会思想等方面对留学生加以种种控制,当然这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根基有关。幼童留美期间,任监督的陈兰彬与容闳在有关幼童学习、游戏、改装等问题上常常发生摩擦。为避免幼童被洋化,规定在外国学校学习“西学”之外,还需要在留学监督的主导下随时“课以中国文义”,如《孝经》、《五经》、《国朝律例》及《小学》等,遇有节日则监督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甚至早晚要拜孔子神位,唯恐幼童因“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已先沾其恶习”<sup>[8]</sup>。

由陈兰彬推荐的后任监督吴子登更为顽固,认为留美幼童放浪淫佚,即使能学成回国非但无益于社会反而会危害社会。正是由于顽固势力的极力抵制与从中作梗使得留美幼童不久即被遣送回国。在今天看来,年幼儿在留学国外的同时学习一些本民族本国的传统经典文化是很有必要的,但清末顽固派在对待留美幼童上却最终因噎废食。事实上,留学生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引进与传播,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对于留美幼童而言,清政府对福建船政学生的留欧教育已经十分重视。从留欧学生的生源选拔、留学目标以及管理上即可看出其重视程度之高,而留欧教育比幼童留美只晚了几年而已。而且这些留欧学生再也没有被规定必须“望阙行礼”,也没有遇到矢如雨集的诽谤与中伤。甲午战争后,整个社会兴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自费留学开始大量地出现,清政府也极力地鼓励留学日本,并制定了相应的鼓励措施和旨在更好地促进留学的约束措施,这集中体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以及张之洞等个人上奏的有关派遣留学生的各种呈折中。种种举措意味着清政府对待留学教育已经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乃至出现了“给予优秀的留学生以进士、举人资格”,“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

者,各视其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sup>[9]</sup>。这种“科名奖励”和“由留学入仕”与“非科举毋得与官”不啻为天壤之别,对由“科举入仕”的举子心态形成了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冲击。

依此看来,近代留学教育对于科举制的冲击强度亦可谓是空前的,并且其通过清政府的官文加以规定使得这种冲击具备了法规政策的支撑与保证。留学热潮的发生意味着作为支撑封建官僚制度的重要杠杆的科举制虽然由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仍具有非常强的向心力,但较之前代社会,这种向心力无疑已经减弱,毕竟有不少的有志之士包括清政府的一些权臣在内,已经将近代中国所受的侵辱指责到了已落伍时代的科举教育上,而将洗辱的进路寄向了留学教育。与此同时,举子的传统社会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改变,开始热心于选择留学教育,“授予优秀留学生以相应的科名和官职奖励”的鼓励政策在客观上将相当数量的举子吸引到了留学的轨道上,由此对科举制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效应。

随着清政府和社会民众对留学教育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愈益重视,其从物质、制度乃至精神的不同层面对科举制形成的冲击也不断地加剧,以至于出现了科举废止前的“授予优秀留学毕业生以科名乃至相应官职奖励”的官文规定,开辟了一条由留学入仕的新通道。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文化的中国社会,当千年的仕进之路所受抨击日甚一日,要求将之停废的呼声也愈益高涨,授予留学生以科名乃至官职奖励不啻为另外一条新的且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仕进之路。因此可以认为,作为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留学教育以隐性和显性两种不同的方式冲击了科举制,对科举制的解体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2.
- [2]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53.
- [3] 李华兴, 陈祖怀. 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J]. 史林, 1996(3).
- [4] (日)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 日本教育的现代化[M]. 张谓城, 徐禾夫, 等,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 [5]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40.
- [6] 杨齐福.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J]. 扬州大学学报, 2003(3).
- [7] 筹备夷务始末: 同治朝卷二十五[M].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30: 10.
- [8] 奕昕, 等. 奏请将出洋学生调回折[M] / 洋务运动(二).
- [9] 舒新城. 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M]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4: 186.

[责任编辑 石俊梅]